

感恩——暨南情

吴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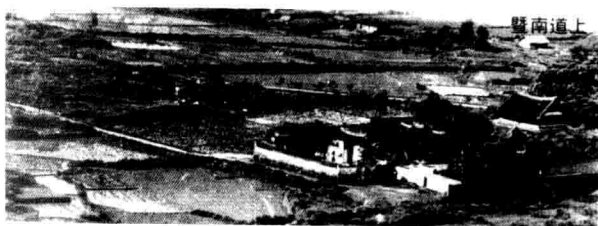


感恩暨南情

吴可贵



学官俯瞰



暨南道上



竹篱茅舍

暨南大学

親愛母校

圖書館

惠存 友正

校友吳可貴敬贈

二〇一一年兔年九十三岁

五月十五日

南 易

獻母校二〇一一年

一〇五周年

校 庆

紀念



目 录

1. 感恩暨南情念建阳·····1
2. 怀念宪文老师·····2
3. 先生风范 山高水长
 缅怀许杰教授·····5
4. 春风化雨念师情
 ①. 缅怀何炳松校长·····8
 ②. 缅怀孙怀仁老师·····10
 ③. 感念吴大琨老师·····13
5. 长留情谊在人间
 悼念吴肇琦同学·····15
6. 校史画卷 扣我心弦
 观《暨南春秋》有感·····18
7. 暨南情结 十年寻友
 陈默寻找严小春的故事·····20
8. 给北京陈默学长的短信·····23
9. 文思滔滔道真情
 贺邢济众学长八秩寿诞·····24
10. 南暨声教之光
 贺新加坡暨南校友会创会60周年·····29
11. 情结暨南六十年
 暨南大学母校95周年校庆贺信·····32
12. 许杰老师微笑着 永远活在我心中

感恩暨南情 念建阳

建阳山水依旧在，
往事如烟不再来。
艰难朝夕从何寻，
迎听天鸡一唱快。

人生梦衣天手裁，
纷纭彩色由所爱。
甜酸苦乐世味斋，
最是满足称心怀。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于
南昌博爱老年公寓

怀念宪文老师

一九四一年夏天，正是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艰难时期。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用一根小木棍挑着两个防空袋，一袋换洗衣服，一袋书籍讲义，走路乘车，翻山越岭，由赣东北到达闽北山城建阳县，兴致勃勃地投考暨南大学福建分校。第二天报名时，两位神采奕奕态度儒雅的中年人坐在一长条桌边给我们办报名手续。事后我对同伴投考的吴三省（已于69年猝亡）同学说，这两位先生很可能是老师，特别那位不戴眼镜的从仪态上看，很象是位学者。他摇摇头说：不会吧？他从眼镜下透出一种疑惑的眼神。及至录取上学，居然得知这位不戴眼镜和蔼可亲给我们考生办理报名的竟然是暨大分校主任、商学院长、年仅三十六岁的经济学家周宪文教授。周先生是我进暨大求学第一个认识的先生。因此，我在入学之初就在心里对周先生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和钦敬感，待与其他同学渐熟悉后闲谈中得知他们也都与我甚有同感。日后与宪文师接触多了，听其教课多了，此感越来越深化。现在，我虽年进古稀，两鬓久斑如霜雪，而此感却仍未稍减，只是几十年来的寒来暑往，物换星移，海天遥隔，令人倍增无限念情。

我们上学时，好像是由吹号为讯的。秋深了，天不亮号声洪亮地响起来，催人在黑暗中摸索穿衣，起床早操。当初，我住在一百零八人（同学戏称一〇八个好汉）的大寝室的一个上铺，一次匆匆下床把一个同学头踩了。我心疚不安之余，特到教务处办公室（办公室兼卧室）向周先生建议把早起时间改晚一点。他笑着说：“的确有此必

要，我也把袜子穿反过的……。”后来，他在同学集合时讲到这一情况，同学们听了都大为畅笑。一件小事所流淌的师生情谊，何等融洽。

先生讲经济学，真是对学生太富吸引力了。每次讲课，在用文庙大成殿改成的大礼堂内，各院系的必修生、选修生、旁听生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而且都是争取早拿笔记本占位置的。听讲时，同学们耳听手写，鸦雀无声。莘莘学子能虔诚好学如斯，是先生精神学问熏陶感染所至，以后我们老同学见面时对此犹常津津乐道不已。先生讲价值论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的学说，使我耳目大新，天地顿宽。新奇感和求知欲，驱使我以极大努力学习先生的课程。我在入大学前，原在私塾还学过《史记》、《左传》、《四书》、《幼学》、《纲鉴总论》等书，对历史感兴趣，考大学就选了历史专业。在听了先生讲经济学后，志趣为之大变。当时适逢暨大筹办东南联大增设法学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三个系），我便忝在其他十一位同学之后转读经济系了。具体转系又承蒙教我们财政学的法学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孙怀仁先生热情关怀，愿望终于实现，回想一个青年人的学习与老师及其教学多么密切相关，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先生门下弟子数千，海内外英才辈出，只是抚今思昔，独我无才玷先生，思之殊深怅然！

周先生早期主编有《经济学大辞典》、著有《经济本质论》等书，都能慨然借与同学阅读。那时最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周先生的“以工立国论”，同西南联大一位教授的

“以农立国论”之间在大公报上展开的学生辩论。我们同学仿此曾举行一次与此问题的辩论会。我在抓阄时偏参加“以农立国论”一组。辩论完了，请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好像是总裁判）讲话，许先生说得妙：“……事实胜于雄辩……”。也就是肯定了“以工立国论”的胜辩，同时也给了辩败者一个愉快的鼓励。周先生虽然当时不在校，却是在他影响下进行的一次生动的学术性活动。当那抗战时期，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生灵涂炭，我们还能读书已是万幸，又有许多名教授教导则更是万幸中之大幸。

一九四五年暑期，在抗战胜利全民欢腾之时先生赴台，睽违教范四十余年。望云天以遐思，忆教诲而寄情。祝愿先生耄耋之年，健康幸福，象文庙桂花永香，建溪流水长清！

最后，借古人之词而颂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先生风范 山高水长

深切缅怀许杰教授

许杰先生是我国著名老作家、老教授。他以如椽之笔在教苑文坛两块园地辛勤耕耘了七十多年，弟子越三千。先生高寿九十又三，因脑溢血溘然仙逝。我作为先生战时在暨大任教时的学生，闻此卞讯，一时间，五内俱痛，难以言状。五十年前我考入内迁福建建阳暨大时，先生是我的导师兼基础国文教授，我常趋庭请教，及至七十年代后期与先生取得联系后，又频得先生关怀的情景，连绵展现，历历在目。

1941年秋，正是我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许先生携妻子儿女长途跋涉从粤北山地来到闽北山城建阳，重回暨大担任重职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教学任务繁重，生活却极艰辛。住在文庙女生宿舍区一间房内，全家四人工作和生活皆囿于此一隅之地。我由于学浅识薄，思域狭窄，每有疑却又好问，特别是思想认识和世情看法上的疑窦，好向先生坦陈请教。先生总是和蔼可亲接待，热情耐心启迪，使我有如坐春风而沐化雨，迄今记忆犹新。

先生教我们基础语文课时，没有现成课本，都是一些油印的活页讲义，内容基本上是古代文言散文。读多了，我感到好奇，先生是现代文学家却选一些古代教我们。我到先生家诉说我喜读鲁迅文章，尤其杂文，我还学到鲁迅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等。先生慨然指出，鲁迅不就是古典文学基础极厚的吗？读了这些古代文章，既

有利于了解古时的社会，增强认识问题的能力，又可学其文笔，那不就更有利于学习鲁迅的文章了……后来，我将先生讲的选文连贯起来重读，清楚地认识到这都是些揭露过去社会黑暗的文章，而且一般在集子上少见或不曾读到过的。以后，我慢慢感到这种选文和教学可能是一种“借古喻今”的方法。在那白色恐怖统治的年代，哪能容许讲鲁迅呢？我是山乡小子，全然不知先生的一番衷曲。待到在报（好像是《前线日报》）上继续读到先生的《的笃戏》小说，明白了先生是进步的左派作家，我幼稚的心灵似乎才有感悟。有人说，上大学主要是学方法。先生之言和所教之课，不就是给我授予了学习和观察的方法吗？这真是“润物细无声”了。

有一次，一个阔气的厅长来到学校，向学生演说。这个人在说话中攻击鲁迅茅盾两大文豪，尤其是拿两位伟大的笔名大加诬蔑，其貌堂皇，其言荒唐。过后，当我把这位官人的满口荒唐话告诉许先生时，先生明显的露出鄙夷的愠色说，这种人还不就靠了说这种话做官吃饭的……。先生之言，一语道破天机，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们的丑恶嘴脸。

1977年夏，我在南昌见到了先生女儿许力。我将自己地址告诉许力，也记下了先生在上海地址。在秋季开学工作正忙时，突收先生来信，说他老人家还记得我这个过去的学生，耐不住性子等我去信，故先写信给我，我一时喜出望外，万分激动，连夜修书问候先生。从此，隔绝三十多年音讯的师生之谊又联系上了。在近十几年来，我仍常

得到先生关怀、教诲和鼓励。1981年和1986年，我两次外出途径上海时去看望先生，先生总是高兴接待，问长问短，从建阳时期谈到现在，还拿出周宪文教授的信和著作给我看，使我这个老学生象小孩回到自己的家和父母身旁一样。1989年10月，先生知我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在他“患过小中风，舌头硬，说话不灵便，两腿软，走路不稳定”的情况下，还给我来信甚表同情，并祷祝我能度快乐的晚境……当一个人活到两鬓双白时，还能得到师爱的温暖，谁能不由衷感激涕零？今年四月，当我在《新民晚报》上读到先生在病床写的短文时，写信问候先生的病情，很快就收到先生“草于病床之侧”的复函。知我近来情况较好，于字里行间一再表示高兴。（……）唉！真未想到，这竟是先生给我最后一次的慈祥的心音，最后一次鼓励和关心的盛情。人老未衰，尤须上进。先生美意，刻骨铭心。

先生乃士之智者，智者立言，既著书又教人七十余年，先生风范，山高水长！

春风化雨念师情

前言

今年是我大学毕业五十周年。光阴如水，逝者如斯。想到当年读暨大时老师对我的教导和以后的关怀，半个世纪来，感师之情常常激荡胸怀。社会将老师比作园丁，教诲比作春风化雨，形象道出了老师的辛劳和爱心。我们学生则是接受老师栽培的桃李，开花结果主要是老师汗血的结晶。当母校九十周年校庆来临之际，我的一腔情怀掀起滚滚念师的春潮。心潮激扬，乃成文字。请让我对昔日恩师留下永远铭心的感念吧！

一、缅怀何炳松校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暨大本校在租界上完最后一课开始内迁。到一九四二年夏，分校已在建阳办学一年，为本校内迁奠定了基础。先是同学老师陆续来到建阳，何校长略后抵达。校长来到学校，就象一家之长回到家，大家心里感到踏实高兴。记得那一天，天气很好，全校师生兴高采烈地由文庙大门外小马路到大马路两旁列队欢迎何校长。当何校长一行人到达路口时，伫候在路旁的老师和同学以热烈的掌声欢笑声迎接何校长到来。何校长身着长衫，足穿黄色皮鞋，脸庞瘦瘦头蓄短发，目光炯炯望着欢迎的师生，频频点头，神情严肃中透着和蔼，向文庙缓步前行。何校长到达建阳，分校历史任务完成，原来“国立暨南大学福建分

校”校牌换上了“国立暨南大学”。由于上海同学来老师也多起来，呈现一派兴旺景象，蔚为大观。不仅如此，从四二年下半年始，学校增设法学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三个学系；加上原有文、理、商三院十系规模扩大了。

至今，我尚记得听过的何校长在大会的两次讲话。在第一次讲话中，何校长指出住在童游街西头的老师同学每天到文庙上课，往返经过狭窄的道路，街路不好，推车和挑担人多，拥挤难行，很不方便，对师生的教和学，都会有不利影响。因此，何校长提出了修路的设想，并指出路好还可给全校师生节省很多鞋子。果然，后来学校在童游街北面田野东西取向修了一条小的专用公路。有了此路，上课前可放开脚步快走，无虞迟到；下课后可缓步慢行，领略田野风光，心旷神怡。我来自农村，每走在这条路上常会油然而生缕缕故乡情思，对何炳松校长的卓见更是钦佩不已。

在第二次听何校长讲话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长鼓励我们学生，除学好专业知识，还应博览群书，做到既专又博。校长以自己当时正在看一本关于非洲的书为例，说去非洲不大可能，读了这本书，也就有了这方面的知识，补了这方面无知的缺陷。一个人一生能亲历和看到的地方总是不多的，而未见闻的事情却是很多的，这就要多读各方面的书，从书本上满足自己求知欲望，成为有用人才。等等。何校长语重心长教导，我数十年可谓奉为圭臬，养成了好看书的习惯。当我年岁已老，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书卷有情如故人，晨昏忧乐每相近”（于谦语）时，饮

水思源，更加深了对何校长教导的感激之情。

二. 缅怀孙怀仁老师

孙怀仁老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抗战时在建阳任暨大法学院院长，教过我财政学。一九四二年秋季开始，天仍热。孙师着绸长衫，带金边眼镜，蓄微量短髭，潇洒又严肃。孙师讲课如行云流水，把我吸引得全神贯注，不知时间怎么过去。我学中国经济史课程时，主要参考书有孙先生译的日本森谷克己著的《中国经济史》。多处引经据典，全用中国古籍。我听孙师讲课又读他的译作，油然而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后来我由于受到周宪文、孙怀仁两位经济大师影响，爱上了财政经济学科，并决然和其他十一位同学一道请求转读法学院经济系。为了办转院系手续，我们集伴多次找孙先生，正是由于孙先生的关心，我们十二人的学籍问题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得到了解决。

一九四四年春，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将法学院并入英士大学，暨大杜佐周教授出任校长，孙怀仁教授出任教务长仍兼任法学院院长。法学院的全体师生整体迁往浙江云和县大港头镇，后又迁泰顺县里光村。法学院始终单独在一个地方，未与英大其他两院在一起。因此，法学院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全然保持着在建阳暨大时的老关系，而且感情更加密切。特别是我们经济系十二人，都是由暨大文、商二院经孙先生关心转院系而去的，和孙先生关系更好更接近。不仅是可到孙师家去请教问题，无事有暇也去孙师家玩。有一次我在孙师

家借玩机会讲到毕业后走向社会的艰难时，孙师教导我到社会上工作，要“急事缓办，缓事急办。”并说缓事不急办，易于造成不办；急事不缓办，就易于造成错误。我当时只懂此中道理至好，牢记到今天记忆犹新。后来渐渐明白老师用缓急性质的事情，采用相反的缓急不同的方法处理的科学性，也就是给了我辨证处理事情的永恒受用的钥匙。

我在写毕业论文《商业资本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研究》，曾向孙先生请教，在文中颇多引用王亚南先生的著作。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快毕业时，孙先生为我曾三次去信给在福建永安任经济研究所长的王亚南先生，介绍我去工作。终因王先生已去重庆未果，后又给崇安茶叶研究所写信也未联系上。再后又为联系浙江省政府科员，我却不愿就。最后，孙先生墨笔亲书一信给王造时先生由我面交，嘱我回江西请王先生帮忙。孙先生这种对我的关怀，我一生感激不尽。

物换星移几十秋，一九八〇年夏，我远行经过上海，特到上海社科院去看望阔别近四十年的孙先生。孙先生此时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当我走到社科院传达室说明来意时，传达拒绝我晋访，并说孙先生教学几十年，学生太多了也记不清了，所以学生一律不接见。我一听头上似泼了一盆冷水和挨了一棍。我在板凳上坐下沉思起来，又想起了孙先生教导的“急事缓办，缓事急办”。叫自己不要急，慢慢想办法，坐在传达室等下班总可见到。传达不时斜眼望望我，一段时间过后，传达同志起了善心说：“好吧，我

给你挂个电话上楼试试看，我看是白问的”。电话挂通过了片刻，回话：请他（指我）上来。我一听全身细胞都活起来，连声说：我说孙先生会记得我，会接见我的。我马上登楼，想到此刻能重见到孙先生高兴得心快跳出来。秘书说孙先生正在主持会议嘱我稍等。等了一段时间，孙先生放下会议到办公室接见我。孙先生满脸微笑领我至他办公室，我知他会未结束，抓紧时间汇报几十年在中学任教，退休后在江西财院经济系受聘教西方经济学史。他指出我不应退休，回江西争取复职。当我说孙先生的“急事缓办，缓事急办”的教导，我几十年牢记受用时，老师和我同时欢笑起来，好像回到当年法学院。我问先生寿高是否已过八旬，见老师精神身体好我心里非常高兴。先生说：“我给你们讲课时还年轻”。意思当然说是未过八旬。我与先生又都笑起来了。我问先生儿女都在上海吧？他说都在外地，情况也都好，等等。我不敢多占先生时间，说回程争取时间再来看先生，便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下楼走到办公室一楼出口殷切叮嘱我：工作上教学有何困难写信告诉他；回到南昌最好争取复职；回程尽有可能再来一次。这些话多么像父母在儿女远行前的嘱咐。我激动得连连答

“好！”依依不舍离开社科院，心中充满温暖和幸运之感。回程再过上海时，正逢暴雨倾盆连日，沿途可见水患已露苗头，未敢在上海久留，当天便匆匆转车回了江西。未想到这竟是与孙先生此生最后见面。先生在学术上教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辉煌贡献，光荣地仙逝离开了人间。先生精神永垂不朽！我这个老学生念师之

情当永怀到我离开人世之日。

三、感念吴大琨老师

吴大琨老师在暨南大学教经济系课时，我是授业十二个学生之一，说来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三年的事了。那时，吴老师还很年轻，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瘦瘦身材，一根红领带佩上藏青西服，和蔼态度，洋溢着青年教师的朝气。老师讲起课来声调清亮，侃侃而谈，激动时伴以手势，给人印象难忘。记得在童游街北端一个祠堂大厅听老师西洋史课时，一次我向老师请教“封建主义”一词含义，我说在《经济学大辞典》中未查到这个词。吴师和蔼地说这个问题另找时间再谈。次日上午，祝丰同学交给我一本书说是大琨老师叫他转给我的。我接过书一看顿时喜从心中发，原来这是一本苏联百科全书的一个分册《封建主义》。

吴师有的放矢针对我的疑窦借这本书给我看，当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由此，使我在读历史的思路开始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以往读《纲鉴总论》、部分《纲鉴易知录》、中学课本和古书的部分史传，根本不懂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道理。吴老师借书给了我一个新的启迪和导向。我暗自发现自己学习的缺陷，意识便努力看这方面的书。越看脑子似乎越开朗一些。以后也就慢慢学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当我写毕业论文《商业资本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之研究》时，我也就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分期和分析